



▲杨联陞讲授京剧

▶杨联陞与蒋彝说相声

◀ (上接4版)

班,到新罕布什尔一家小学做毕业演讲,循循善诱,跟孩子们强调扎扎实实学好语言的重要性。他们只是不愿牵扯于行政事务,而更希望留出时间漫步在神学街和住处间,与书为伍,会友论学。

这和社会活动能力极强的费正清形成鲜明的对比。二战期间,他应召服务于华府,长达五年,“参与筹建把学术机构转变为服务于战争的研究机构的工作”。费正清每周都在哈佛广场附近的寓所举行下午茶会,各方人马无不应邀。他在晚年回忆说,致力于亚洲研究,引导人们关注亚洲是他年轻时立下的一生志向。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不久,费正清成为周恩来的座上宾。1978年,他还随蒙代尔副总统访华。在美国的学术组织里,他先后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和亚洲学会的会长。他的回忆录通篇充满了对他学以致用的志趣和把中国历史与现今社会相联系起来从事研究的描述。

费正清在《中国回忆录》里只字不提在哈佛共事多年的柯立夫和杨联陞两位同行,倒是两次写到贾德纳,可评语都带着实在不敢恭维之意。1936年,费正清在牛津大学完成博士学位之后回美,走访了多所大学的远东研究中心,拜访领域内的学者。在哈佛他有机会和贾德纳面谈,之后他马上评价道:“他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学者”、“一位无私的朋友,知识渊博,待人热情”,但是说自己不理解贾德纳竟然“不善概括和综合,因此没什么研究成果”。费正清还对贾德纳的教学成效颇有微词:“研究生们从他那里受益良多,然而本科生从他那里似乎学不到什么东西!”另外,他还记了1950年美国历史学会竞选协会主席和副主席时,贾德纳提出不能让那副主席自动升

任主席的建议。费正清说这位“博学而不切实际的贾德纳”,提出的建议在理论上来说是对的,“但操作起来,实为荒谬!”其实,担任学会主席之类的职位对于热心参与学术组织、乐于社交的费正清来说,可能算是大事,但是对贾德纳这样的书斋学者来说,实在无足轻重。

上文提到的1956年的冲突在赖世和与杨联陞之间的频频交流和协调下,得到了平息,但是欧洲的汉学(Sinology)和本土的中国学(China Studies)之间的分歧并不能消除。1962年,杨联陞日记里记载“费正清对《哈佛东方学报》有不客气讽刺”,可能是因为《学报》选用汉学之风浓重的文章,而且频频刊登柯立夫和杨联陞自己的论

文。进入1960年代,在美国学术界,中国学得到长足发展,同时美国高校内掀起一股大学校园应成为社会和政治活动的中心的潮流。美国亚洲学学界展开了一场有关欧洲汉学和中国学的大讨论。在1964年的亚洲学年会上,学者们各抒己见,就汉学和以历史和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的做法展开讨论,众说纷纭,讨论的主要内容刊登在当时的《亚洲学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当时,不少学者认为欧洲汉学已经过时,甚至已经完全失去了学术的生命力,但是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和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持有较为客观、中肯和平衡的观点,认为汉学和区域研究、以特定的学科取向研究中国的做法并不矛盾,且能相得益彰。

在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国



1947年的费正清



1959年,杨联陞与同事。后排左起:鲍大可(A. Doak Barnett),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Judith Shklar,梅谷(Franz Michael),Edward Wagner,芮玛丽(Mary Wright),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柯睿格(Edward Kracke)。前排左起: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牟复礼(Fritz Mote),霍克(Charles O. Huckler),杨联陞,瞿同祖,周策纵,John M. H. Lindbeck,赖世和(Edwin O. Reischauer)。

史的影响越来越大。他认为发展区域研究,以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取代传统汉学才是研究中国的真正有效的方法。由此看来,原来传统意义上的汉学研究远远不能满足二战以后的国家和社会需求。从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中后期,美国本土的中国学基本成形,早年传入美国的中国传统训诂学、考据学和欧洲汉学之风逐渐在学界消隐。

柯立夫和杨联陞当然难以回避这一股新的学科发展潮流,期间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哈佛燕京学社汉学引得编纂项目的终结。1957年,也就是叶理绥离任的第二年,哈佛燕京学社即决定停止洪业负责的汉学引得编纂项目(Harvard-Yenching Sinological Index Series)。这一项目历时二十多年,出版了41种正刊,23种特刊,合计64种共84册有关《春秋左传》《论语》《孟子》《汉书》《大藏经》《水经注》等古籍的引得,确实花了不少经费,很多学者为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就这一项目的终

止原因,书面上解释说是因为工程过于庞大,尚需好几十年的时间和难以承担的巨资才能完成。到了1973年,哈佛燕京学社正值搬迁,原来在地下室库存的引得项目积累的大量卡片无处安放,学社决定要么销毁,要么搬到别处。哈佛燕京学社董事会讨论如何处理这些卡片时,意识到如果一下子销毁所有这些卡片,肯定会引起异议。由于柯立夫常用这些卡片,董事会同意出资将卡片全都运到柯立夫在新罕布什尔州住处的地下室。如有学者需要,柯立夫可以帮忙调出。这看似一个存放资料的空间问题,但事实上,先是这一项目的停顿,后来是卡片的搬出,都说明了汉学在1960年代之后的遭遇,而把所有的资料卡片搬出哈佛燕京学社正象征着汉学不再举足轻重。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引得的卡片和柯立夫的私人藏书一起,依然被存放在新罕布什尔一家教堂的地下室。

1960年代以后,柯立夫依然故我,做他的以文字学和论

(下转6版) ➔



1972年,北京,费正清夫妇与周恩来总理、乔冠华副外长在一起